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 共产国际与 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史

罗重一◎主编

张楠 张俊 熊新文◎副主编

GONGCHANGUOJI YU  
NANJING GUOMINZHENG FU GUANXI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 共产国际与 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史

罗重一◎主编

张楠 张俊 熊新文◎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史 / 罗重一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325 - 2

I . ①共… II . ①罗… III . ①共产国际—关系—国民政府—国际关系史—研究—  
南京市 IV . ①D829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978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416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顾海良

新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要求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武汉大学一直居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编纂出版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就是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尊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要求，要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的出版，能为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增添新的光彩。

第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影响力。把提高学术影响力放在首位，是从学科建设视阈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求。学科建设以学术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级学科，在提升学科的学术性时，要按照学科建设内在的普遍的要求，使之具有明确的学科内涵、确定的学科规范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学术影响力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在于国内的学术影响力，还应该树立世界眼光，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学术研究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导向的。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不仅有利于达到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有利于国际

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交流，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传播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科学考据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编辑与研究等，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不但要高度关注和重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要参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上，我们要有更广泛的话语权，要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别人在研究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成就、产生了哪些理论的和实践的成效等。如果一方面强调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另一方面却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论坛上被边缘化，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学科建设的结局。

第二，要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任何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就是这一学科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使命。在实现这一影响力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重点；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于实践、以此推进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要体现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上，并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定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学科建设的应用价值。

第三，要提高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安全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成效，进一步维护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要提高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加强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是一定社会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定社会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最为重要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和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全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用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头脑，内化为全体人民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共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学术的影响力、现实应用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对四个方面影响力的理解中，既不能强调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而否认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也不能只顾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要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全面地探索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力。

我衷心地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能在提高以上四个方面影响力上作出新的贡献！

## 前　　言

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内各派军阀林立，彼此争权夺利，致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国家亟待统一的形势下，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其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期间，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又由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与苏联当时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性，再由于受到英、美支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阶级对抗性，使得中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形势显得异常尖锐和复杂——南京国民政府既要消灭“内患”（尤其是中共）以完成建国大业，又要解除外忧（日本侵略中国而导致的民族生存危机）；既要进行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又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斗争中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进行合作；既要保持对英、美等西方大国的追随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又要在对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外交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牵涉一系列历史上签订的涉华不平等条约）；既要学会与中共的“和平”相处（抗战时期），又要学会怎样在苏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夹缝中生存，等等。特别是怎样处理好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着严重分歧，但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力的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成为摆在南京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18年中，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着急剧而又复杂的变化：新旧军阀之间的斗争；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西安事变后苏联、中共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纵横捭阖；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与英、美等大国对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以牺牲南京国民政府为代价）的斗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这种势力范围划分的抵制，等等。这一切都以各自特有的色彩，跃然于画卷之上，为历史涂抹下浓厚的一笔。

本书拟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巩固为基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

动为主轴，通过对“三国四方”（美国、苏联、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还原，旨在论证“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足点”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希望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对解决海峡两岸统一问题的若干启示。

本书中所写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范围为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1937年12月从南京撤退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及1946年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包括汪精卫的南京汪伪政权。

# 目 录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	(1)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紧急阶段的中国革命 .....	(1)
一 共产国际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	(1)
二 国民革命紧急阶段的到来 .....	(9)
三 紧急阶段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	(11)
四 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	(17)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	(20)
一 宁汉合流与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召开 .....	(20)
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联合北伐 .....	(25)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 .....	(28)
四 中间派别寻求中国出路的主张及其活动 .....	(36)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 .....	(46)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武装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始 .....	(46)
一 八七会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转变 .....	(46)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 .....	(50)
三 共产国际与中共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	(54)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	(62)
一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	(62)
二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 .....	(70)
三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	(73)
四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错误 .....	(77)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点 .....	(81)
一 共产国际与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	(81)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	(85)

三 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	(88)
<b>第四节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军阀关系</b>	<b>(93)</b>
一 中共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提出及实施	(93)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西北地方政局	(96)
三 共产国际与东北地方政局	(98)
四 共产国际与中国北方地方政局	(103)
<b>第五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b>	<b>(105)</b>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方针的确立	(105)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村的苏维埃运动	(109)
三 共产国际与中国城市的苏维埃运动	(113)
四 共产国际的富农政策与查田运动	(117)
<b>第三章 共产国际、苏联与第二次国共合作</b>	<b>(124)</b>
<b>第一节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方针</b>	<b>(124)</b>
一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124)
二 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应对	(128)
<b>第二节 共产国际七大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b>	<b>(140)</b>
一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40)
二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46)
三 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147)
四 共产国际与《八一宣言》	(151)
<b>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b>	<b>(153)</b>
一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纷争	(153)
二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各自提出	(155)
三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致性	(160)
四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重大差异	(165)
五 两条和平解决方针的差异产生的后果	(176)
六 两条和平解决方针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	(183)
七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对国民党产生的后果	(186)

<b>第四章 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的抗日战争</b>	.....	(189)
第一节 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抗战	.....	(189)
一 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政策	.....	(189)
二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	(196)
第二节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	.....	(202)
一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抗战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	(202)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严重分歧的解决	.....	(204)
三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承认	.....	(206)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苏联利益中心”问题上的争论	....	(210)
一 抗战时期“苏联利益中心”问题的由来	.....	(210)
二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	.....	(212)
三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围绕“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上的 争论	.....	(216)
四 中共与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	.....	(219)
第四节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	.....	(222)
一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回国	.....	(222)
二 共产国际与王明右倾错误	.....	(224)
三 中共对王明右倾错误的纠正	.....	(230)
四 共产国际、中共与皖南事变	.....	(233)
<b>第五章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b>	.....	(239)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	(239)
一 积极疏通多方外交渠道以求冲突的早日解决	.....	(239)
二 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的逐渐走近	.....	(249)
第二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	(258)
一 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与西方外交关系的背景	.....	(258)
二 南京国民政府与英国的外交关系	.....	(260)
三 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	(262)
四 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	(267)
五 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	(273)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	(283)
一 二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	(283)

二	二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	(287)
三	二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	(293)
四	二战结束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	(297)
<b>第六章 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对国共两党的影响</b>		(303)
第一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303)
一	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背景	(303)
二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312)
三	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选择	(323)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及其解散的意义		(326)
一	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326)
二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国际国内的反应	(331)
第三节 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		(342)
一	共产国际解散前夕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	(342)
二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	(344)
三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	(348)
<b>写在结尾</b>		(351)
<b>附录 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共产国际人物简介</b>		(352)
<b>主要参考文献</b>		(360)
<b>后记</b>		(368)

# 第一章

##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紧急阶段的中国革命

#### 一 共产国际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 (一) 武汉临时政府的成立

###### 1. 广州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其不仅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极大地有利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军阀部队，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势力席卷了半个中国。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因为国民政府所属的海陆空军队都受总司令的统辖，所以北伐战争的胜利就为蒋介石赢得了很高的个人声誉。尽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战斗中屡次受挫，但他通过收编军阀部队、金钱收买、升官许愿等方法，使自己的实力在北伐战争中得以迅速膨胀。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sup>①</sup>

北伐军占领湘鄂赣以后，武汉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原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1926年7月15日改为此名）决定将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其议决五款如下：（1）12月5日以前重要人员及重要文件，第一批出发。（2）第二批出发候第一批人员到达后，来电决定行期。（3）各机关普通文件，交总司令部兵站输送。关于广东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省之文件移交省政府。（4）前方各机关地址及布置，委邓择生同志发电办理。（5）迁移费用由党部及政府分别造成预算，由主席决定。

与此同时，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迁之通电云：政府迁移在即，现已停止办公，所有各机关以后致国民政府文电，均请交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转寄，或径寄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存转亦可。至于重要文电应即沿途探投。<sup>①</sup> 随后，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迁武汉，其人员分四批出发。第一批：鲍罗廷、宋庆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等 60 余人组成；第二批：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及随员数百人组成；第三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等；第四批：吴玉章等人。

## 2.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高党权的活动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委员们整天进行紧张的开会和发表演说，主要是说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导。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徐谦任主席，叶楚伧任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办公地点分别为：中央党部暂设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党部内；国民政府先设于武昌总司令部行营，后即迁往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汉口法租界前交涉署内；交通部设京汉铁路南局；财政部设汉口军警督查处；司法部设武昌三道街原江汉道尹公署内。<sup>②</sup> 经过紧张的筹备，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从 192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在武汉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笔者注），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等 9 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sup>③</sup> 并于 1927 年元旦举行了庆祝典礼。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国民政府已顺利地由广州迁到武汉，历史进入了第一个武汉时期。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后，逐步加强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

① 广州《国民日报》1926 年 12 月 7 日。

② 《国闻周报》1927 年第 4 卷第 2 期。

③ 半栗：《中山去世后中国 60 年大事记》，太平洋书店 1928 年版，第 509 页。

1927年2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发布了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过之党务宣传要点》。《宣传要点》明确指出：“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服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为此，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挥机关，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宣传要点》虽然没有公开点蒋介石、张静江的名，但其锋芒所指尽人皆知。

1927年3月7日，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除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外，其余的如谭延闿等人都到了武汉，这无形中增强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声势。8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曾经“无端”免职中央部长，“无故拿武力解散广州特别市党部”。9日，徐谦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将革命行动当作反革命，反过来说恐怕他要将革命当作反革命了”。武汉市反英会议揭露蒋介石是“助长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之威风”。吴玉章在湖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说时指出：“分散党权、剥削党权的，就是现在的总司令同志。”<sup>①</sup>所有这些为维护党权反对独裁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尽管是初步的，但也表明武汉方面同蒋介石的矛盾开始白热化，斗争开始公开化。武汉方面对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宣传和对蒋介石的批判，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 1.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以及国民党内蒋介石独裁分裂行为的加剧，有必要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党内和革命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按照国民党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后又决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但自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来，二届三中全会一直未能召开。其原因虽有战争正在进行的缘故，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破坏和阻挠。蒋介石先是在南昌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无理阻挠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赴汉开会。后来又擅自将会议的日期以各种借口无限推迟。

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否决了蒋介石推迟开会的

<sup>①</sup>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主张，一致通过了“为统一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权威及进行国民革命北伐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日以前在武汉自行开全体会议”<sup>①</sup>的决议。2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增选唐生智、宋庆龄、蒋作宾、彭泽民、吴玉章为中央政治委员，以便被蒋介石扣留在南昌的政治委员到汉前，中央政治会议能够正常召开。

为了催请少数留赣的中央委员来武汉，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陈铭枢、谢晋于1927年2月24日携《全体会议提案大纲》赴南昌。26日，谢晋等从南昌来电，告之南昌方面对于提案完全赞成，但希望能将会期延展数日，以便他们出席。武汉方面接此电后，决定将会议延期到3月7日开全体会议；如南昌委员6日赴汉，则7日为预备会议，至多不得延至10日开全体会议。南昌方面的蒋介石无奈之下，不得不于3月3日以所谓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中央委员于3月6日起程赴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但又要求二届三中全会改在3月12日召开。

3月7日下午6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25人，推选孙科为临时主席。会议一开始，陈果夫便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汉参加会议的意见转告大会，并力主大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的观点是，如果蒋介石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的话，那么会议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谭延闿也带来了如果“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sup>②</sup>的蒋介石口信。

针对谭延闿、陈果夫等人的观点，彭泽民、吴玉章、徐谦等人坚决反对。“当会议主席将会议是否再延期的提付表决时，李烈钧、谭延闿认为到会委员不足半数，不能表决。”但徐谦认为“‘不能以惯例拘束党章’，并且‘自革命上立论，固不必斤斤于人数问题’”。<sup>③</sup>谭延闿则狡辩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吴玉章反驳道：“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谓，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今日大众到会，多数主张要开会的，我们革命党人，一面顾事实，一面顾革命，假

<sup>①</sup> 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sup>②</sup>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页。

<sup>③</sup> 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如有变故，同志多被杀逐，只剩数人，则又如何？试问此时尚开会否？谭同志以为我们不顾事实，本席以为我们真是顾事实。7日开会公开宣布多时，是很光明正大的，不是突然中变。大家应通盘看，不应误会。”<sup>①</sup> 彭泽民发言说：“展至3月7日开会，曾报告各党部并在报纸上发表，人人皆知今日开会，如俟南昌同志全来，则迁延又不开会，实属错误。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介石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sup>②</sup> 吴玉章又发言说：“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sup>③</sup> 恽代英接着发言说，会议已宣布延展过两次，今日开会，亦众见众闻。因有同志未来而展期，已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再延迟，则在报上发表似不好说。又说，大家都感觉党权有提高的必要，不能因蒋介石个人未来便改会期。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当会议主席孙科将10日召开正式会议的问题提付表决时，立即得到通过。大会最后确定“7日会议作为预备会，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审查委员会，10日正式开会”。<sup>④</sup> 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到汉参加会议。会议最后选举谭延闿、徐谦、孙科、宋庆龄、顾孟余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 2.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正式举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正式召开。徐谦首先报告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及其经过情况。接着陈友仁报告了联席会议期间办理外交的情况。会议决定：“对于去年12月中在武汉成立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认为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该临时联席会议现虽结束，但所有议决案，在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sup>⑤</sup> 会议还议决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① 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② 同上。

③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页。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全书简称为《国民党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⑤ 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